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巨译的诞生

伍杰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南昌

0124433

巨 译 的 诞 生

伍 杰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新魏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6 印张7 插页1 字数15万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000

ISBN 7—210—00035—6/J·13

统一书号: 10110·538

定价: 1.50元



中：《希氏内科学》中文版译者王贤才

左：《希氏内科学》中文版责任编辑徐诚

右：本书作者伍杰

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

——辛弃疾

—

人世间，有书的山，书的海！

每一部书的诞生，都倾注着著译者、也倾注着编辑的感情和心血；都有自己不尽相同、不平凡的经历。我所要讲的这部巨译的诞生，更不一般。也许，它是一个现代的神话。的确，它象神话一样有趣。

这部巨译，就是《希氏内科学》，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第十五版《希氏内科学》。译者是江西的王贤才，责任编辑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徐诚。

说来十分有趣：三十五年前，一个普通医学院的学生王贤才，慕名于《希氏内科学》，在图书馆登记借阅，等了半年才借到手。不久前，有人告诉我，他称过英文版《希氏内科学》，是十一斤半重。王贤才被这部巨著深深地打动了，为它所倾倒。他

决心将它翻译成中文。三十五年过去了，经历了漫长的岁月，他终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，把决心变为现实。最近又有人把中文版《希氏内科学》称了一下：平装本十个分册，重达十斤。版本经过多次修订，内容全新，字数增加了二分之一。这是三十五个春秋这位顽强的译者心血的结晶。三十五年的工夫，就是铁杵，也磨成了绣花针啊！

《希氏内科学》啊！你是一支命运的晴雨表，显示着王贤才生命的晴和雨、悲和欢！你又象一支美妙的乐曲，记载着他生命的音符。这些音符，曾因种种缘由，始终未能谱成曲调。只有到八十年代的今天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才谱成了一首完美的歌。在你的身上，标志着时代的变迁。你，应该说是时代的产物。

乐曲要有出色的伴奏，才能显示出它动情的音韵。王贤才最好的伴奏者是谁？就是徐诚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汉文科技编辑室主任的徐诚。他们共同演奏了这部难得的曲谱，歌声是那么悠扬悦耳，又是那么庄严、凝重。它——《希氏内科学》，飘荡在祖国的大地，飘荡在四化建设洪流的浪尖。

《希氏内科学》，高高的一摞，象座小小的山峰，呈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凝望着它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

春日的朝阳，是美妙而神奇的，它是温暖、力

量的象征。它在耀眼的彩霞烘托中，离开了地平线，冉冉升起，光华四射。因为有彩霞的烘托，显得更为艳丽，给人以无与伦比的美的享受。

春花，五彩缤纷，放出醉人的清香，是那么富有诗意，使人动情。然而，我更喜欢那扶持花儿的片片嫩叶，这不仅因为它的生命力比春花更为长久，而且还因为有了它，才能成为一幅完美的画。

可爱的彩霞！可爱的绿叶！你和朝阳、春花一起，才织成了诗情画意的妙境；才使得人世间的的生活更为丰富、充实。

亲爱的读者啊！当你漫步书海的时候，咀嚼着书香味儿的时候，你想到了谁呢？想到了作者、译者，是的，他们是书籍的母亲，他们有不可磨灭的功绩。但是，你知道么，还有那些默默耕耘的编辑。如果作者、译者是母亲，他们便是奶母，在奶母的抚育下，婴儿才得以健康地成长。

我崇敬作者，同样敬重编辑！就象我喜爱鲜花、朝阳，也同样喜爱嫩叶、彩霞一样。

还是拉下沉思的帷幕，回到现实中来吧！

请你看一看1986年5月6日的《光明日报》吧！第二版有一则小小的消息：“《希氏内科学》（第十五版）中文版，全书十册，于四月下旬，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齐，在全国书展期间发行，奉献给医学界读者。《希氏内科学》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医学

巨著，第十五版是由美、英、法、联邦德国等国二百三十七位知名学者集体撰写而成，全书共四百七十万字。中文译本是由现任《江西医药》主编，中年内科医师王贤才独立完成的。”这里有一点没有提及，就是它的责任编辑是徐诚。这也不足为奇，从来编辑工作都是默默无闻，为人作嫁的；我们的编辑们也都习惯于这样对待自己的工作。“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。”毛泽东的名句，用在编辑身上，真是再贴切不过了。然而这一回，我却忍不住要为可敬的编辑唱一支绿叶的歌。

一部多国学者撰写的巨著，由王贤才一个人翻译，他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！也许你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翻译的，他又是如何幸运地巧遇徐诚，他们俩又是怎样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的。历史上有个俞伯牙，是个音乐家，当他无意中遇到钟子期的时候，是多么高兴啊！因为他遇到了知音。“伯牙善鼓琴，志在高山。子期曰：‘善哉，洋洋兮若江河！’”这便是“高山流水”的来历，它反映了伯牙、子期的友谊。如今，王贤才和徐诚在共同的事业中，象伯牙与子期一样，成了知音。他们为了翻译、编辑出版《希氏内科学》这部巨著，屡遇荆棘，真是惨淡经营，历尽坎坷！虽说不上惊天动地，却也感人肺腑！

二

我知道王贤才的名字，那是半年以前的事。热情奔放的徐诚，说起话来特别快，那一连串的字，吐出口来，哒，哒，哒，哒！就像是放机关枪似的。这能体现他的性格。他性子急，办起事来，象旋风一样，效率也高。在一次谈起科技出版工作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知道么，王贤才可是个人物！从学生时期立志翻译《希氏内科学》，历尽坎坷，两次焚稿，十年浩劫中由‘右派’升级为‘反革命’，判刑十二年，在劳改队还不罢休，终于在监狱里第一次译完第十三版《希氏内科学》，全书三百四十万字。这个人有信念，有追求，他知道祖国将来需要这部书。他这样的治学精神，谁能做得到呢？以后他对照第十四版，又补译了一百六十万字。不久国外又出了第十五版，他为了把最新的版本奉献给中国读者，又毫不犹豫地舍弃已经完成的译稿，重打锣鼓另开台，翻译第十五版……”听了这些话，我眼前勾画出了一个那么高大又那么具体的形象！一个顽强拼搏、奋斗不息的知识分子形象！

是的，王贤才就是这样进入我的心田的。也许是他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，我一直以为王贤才一

定是一个身材高大，甚至带有那种严峻而又粗犷的气质的人。可是，当我在1986年3月，终于有机会见到王贤才的时候，却出乎我的意料。他个儿并不高，有点儿清瘦，白白净净的脸，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镜，文静得近乎腼腆。虚构的形象消失了。我没有来得及嘲弄和揶揄自己（我是常常这样讥讽自己的），忽然又产生了另一个意念：“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许多愁”，这么个文弱的书生，怎么承受得住那么多严峻的考验，走过那么艰辛的历程？在他那普普通通的躯体里，却始终燃烧着一团烈火，一团永不熄灭的火，这是多么难能可贵！

我慢慢地探索着他和《希氏内科学》的缘分，他向我介绍，向我诉说，逐渐地，我明白了……

王贤才结识《希氏内科学》是在1953年。那时，他是山东大学医学院的学生。他喜爱学习，善于思索，从老师那里知道了《希氏内科学》。知道了希氏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医学教育家、内科专家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，他组织了一百多位内科专家，编著了一部大型教科书，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专家们集体写作的医学巨著。它在1927年初次出版之后，立即受到世界各国医学界的注意，公认了它的权威性，被称为“标准参考书”。此后，每隔三五年便要修订一次。王贤才想，作为一个未来的医生，怎能不

结识这么一部书呢？那岂不是象埃及人不了解金字塔，中国人不了解万里长城一样吗？他决心要见识见识它。

王贤才急切地跑到图书馆，想借这本书。然而，书少人多，别人已捷足先登了，他只好登记排队等待借阅。一直等了半年，才轮到他，他欣喜若狂地把书抱回宿舍。这已是1953年冬天的事了。

《希氏内科学》象一块磁力特强的磁铁，一下子就把他吸引住了。王贤才犹如一个无知的孩子，突然闯进了一座雄伟的科学宫殿，顿时觉得眼花缭乱，美不胜收。他深深感到这部巨著的论述风格与众不同，它系统、严谨、准确，尤其重视基础理论上的阐述。读这样一本好书，真是一种美的享受啊！

他读着读着，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，这么好的书，为什么不把它译成中文，让更多的人读到它呢？祖国需要这样的好书啊！译书的心愿就这样产生了。新中国一个稚气未脱的青年，暗暗下定了翻译世界医学巨著的决心。

这看来似乎可笑到了虚幻的地步！要知道，当时的《希氏内科学》已是一部由一百多位国际知名专家集体编写的权威巨著，而他——王贤才，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医科大学生，年仅十九岁；各国翻译这样的巨著，都要专门组织一个庞大的译述班子，而他只有一个人，他能做到吗？但是，这却是千真万

确的事实。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海，是有边的；山，是有巅的。你能估计到一个有志者的毅力和韧性么？王贤才，决心用自己的意志拼搏一番。漫长而艰苦的征途从此开始了，无私才能无畏。当时的王贤才，天真无邪，他决心在知识的海洋里，当个搏击风浪的勇士。当然，他并没预料到伴随这个美好的意念而来的，将是与命运的一场严酷的搏斗。

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他决心先译一本医学小册子试试看。1954年，他在医院见习，用业余时间试译了一本英国欧文斯教授的《临床外科须知》。比起《希氏内科学》来，真算是一本小册子了，只有二十多万字。他翻译得十分认真，反复译了五遍才定稿。这充分体现了他治学严谨的态度，也是他此后毕生遵循的原则。译出之后，他寄给上海卫生出版社。1957年，这部译作正式出版了。这虽然只是一次小小的尝试，但他从这里取得了经验，内心十分高兴。这时，他已被分配在北京丰台铁路医院工作。已经产生的意念是不会因环境的变化而轻易泯灭的，他仍然念念不忘《希氏内科学》。

1957年秋天，王贤才终于向《希氏内科学》进军了。他买回了第九版《希氏内科学》，开始了漫长的翻译工作。谁知，正当他翻译了四十多万字，还只占全书篇幅的八分之一时，飞来了一场横祸：1958年6月，他被补定为右派分子，罪名是他流露

过“苏联医学不见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，我国还应学习国际先进经验，不要只学苏联一家”的想法。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是很自然的，我们也是这样作的。但在当时，却被认为是对苏联“老大哥”的亵渎。问题是：他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呢？我立刻想到《希氏内科学》，是不是与这部书有什么内在联系？

王贤才点了点头。《希氏内科学》开拓了他的眼界，使他看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。自然对任何囿于某种方圆之内的观点感到不足。而五十年代的苏联，很多方面确是自外于世界科学潮流的。就拿医学来说，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的遗传学，在苏联却还没有取得合法地位，被打成“资产阶级伪科学”。

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医生，就为这样的事被补定为右派，的确是不幸的。

“你感到委屈吧？”我忍不住问。话刚出口，又觉得是多余的，甚至有点后悔，不该提出这种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。

然而使我更加惊异的是，王贤才却摇摇头，莞尔一笑。

这好象是不可思议的。但王贤才诚恳地告诉我：出于对党特别是对毛主席近乎虔诚的尊敬和信仰，当时，他是“认罪”的，完全接受了对他的批

判，甚至为自己的思想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而感到深深的内疚。因为毛主席在他的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里提出的怎样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中，就有一条：不能有损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。的确，五十年代的青年人都有这样的习惯：当他们的思想与党特别是与毛主席的要求不符合时，总是责备自己。这样，当群众引用毛主席的话来批判他时，王贤才就很自然而又诚惶诚恐地接受了。

两个月后，王贤才所在的医院奉命迁移到内蒙古呼和浩特，支援少数民族地区。王贤才随着医院，来到了草原城市。

虽说他默默地接受了对他的批判，但他还是不能忘情于《希氏内科学》，尽管稍事接触，就已给他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他和《希氏内科学》打了大半辈子交道，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漫长岁月里，“白专道路”、“成名成家”、“崇洋媚外”、“洋奴哲学”之类的帽子，就一直陪伴着他。这是他个人的不幸，也是历史的误会。但王贤才在这一点上，却始终没有动摇过。他真是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啊。其实，“衣带渐宽”算什么！我们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，又岂止仅仅是“太瘦生”的问题，真不知比这要严酷多少、深刻多少！当然，生活又毕竟是多情的，这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的

特征——区别于过去任何时代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。但这当然是后话了。

王贤才说过，当他立下心愿，要把《希氏内科学》译成中文时，作为一个普通的医学院学生，他知道，要实现这个心愿，他得走一段很长的路。现在，他觉得这段路更长更长了。因为他首先得争取立功赎“罪”，争取早日摘掉右派“帽子”，“回到”人民的行列中来，才能继续那个浩繁的工程。

在一个朔风呼啸的夜晚，就在医院旁边的荒郊地^①里，王贤才用他那消瘦的手，划着火柴，点着他已译成的40多万字的《希氏内科学》手稿。

我的心立刻紧缩了。我没有过焚稿的体验。但我想，看见自己付出过辛勤劳动和感情的手稿，自己点火在自己面前化为灰烬，该是一件多么痛心的事。什么是悲剧？据说悲剧就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。何况是自己来把它毁掉！可是王贤才在给我说起这段往事时，却显得非常平静。

“痛苦，”他想了想，说，“当然，不能说不痛

①生活有时真会出现惊人的巧合。28年后王贤才又回到这片土地上，但这里已不是荒郊地，而是高耸入云的内蒙古科学馆大楼；王贤才也不是来凭吊当年焚稿之处，而是在科学馆的8楼会议厅里，对内蒙古科技界的中、高级知识分子们讲述他的漫长、坎坷而终于取得成功的经历，其中当然包括28年前他在这块土地上作出的那个痛苦的抉择——烧掉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成的译稿。

苦。但我是自愿这样做，或者说，自己要求自己这样做的。因为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思想改造，是立功赎罪，是摘‘帽子’。为了集中精力在这上面，我只能把翻译暂时摆一摆。等到什么时候摘了‘帽子’了，那时又会有新的版本出来，我再开始工作。……”

是的，他是带着希望这样做的。希望在人间。希望的篝火还在这个年轻人的心里燃烧。不知怎么，我忽然想起早年读过的小粉红花儿的梦^①，她梦见春的到来，梦见秋的到来，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，告诉她：秋虽然来，冬虽然来，而此后接着还是百花盛开、蝴蝶乱飞的春天。王贤才一定也有一个这样的梦。

果然，新的版本不久就出来了。那是第十版的《希氏内科学》。是啊，科学总是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，不会等待，也不肯宽容的啊。

戴上右派“帽子”的王贤才，虽然还留在医院工作，没有送去劳改、教养，也没有开除、流放，但已没有了工资，每月只给他和需要他抚养的母亲及妹妹三个人发32元生活费。生活是艰难的。但“梦”还是要做下去的。怎么才能把那部大书买到手呢？

他终于悄悄卖了四百毫升血，买回了《希氏内

^①见鲁迅：《秋夜》。

科学》。真是又喜又惊，又爱又愁，还有——惭愧。是啊，虽然他恨不得立刻开始工作，但却还不得不按捺住满腔的激情，把书放回自己的书架上。现在还不是做这件事的时候。学生时期那本小册子，他是背着同学们，每天抢在黎明到来之前的时候，躲在一个“被人遗忘的角落”里，偷偷译成的。但此刻他连这样的“地下活动”也不敢了。因为他是“敌人”，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，只能老老实实，规规矩矩，不能乱说乱动。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摘“帽子”上。他想，摘了“帽子”就好了。

盼星星，盼月亮，这一天也真的给他盼来了：1961年11月27日，医院党委宣布给他摘掉右派分子的“帽子”。这是多大的喜事！他兴奋得一夜也没有睡着。他想，我自由了，可以干我想干的事情了。他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之中，然而，首先想到的还是《希氏内科学》。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倾注到它的身上，对！现在可以翻译它了。

当时，国外已出版了第十一版《希氏内科学》，他好不容易筹款再一次把它买了回来。正当他重整旗鼓、信心十足地又一次向《希氏内科学》进军的时候，唉！谁会想到呢，1963年初，医院开始了“四清运动”。他是有过那么一段受人歧视的当右派的历史的，更不幸的是他业务技术又很强，“四清运动”中自然又是首当其冲，被当作了走白专道